



第二期：

「階級與本土」



《編者的話》

香港近幾年本土意識熾熱。由天星、皇后碼頭的反清拆，到各式歷史建築的保育行動，以至最近針對「自由行」、「雙非嬰」、「限奶令」等的爭議，在在顯示出保護香港本土文化、維護香港特質，已經成為一個香港當下最熱門的文化政治議題。上一期本刊選登的幾篇文章，從回顧十年來七一遊行的角度，不約而同地多少也觸及到本土的議題。今期我們會延伸這個討論，但主題是帶入一個「階級」的視角，把當下香港的各式危機，用階級的視角進行梳理。

階級的角度，是否與本土角度互不相容？

階級的角度，如何能夠補足、豐富和改進本土社會運動的視野？

還是，我們應該指出本土運動的局限，以一個基進的批判角度，重新探索民間社會運動應如何回應香港的危機？

又或者，我們應建立一種怎樣的階級角度，才能回應香港後九七之後的困局？

選刊的兩篇主要文章及其關的幾篇回應，讓讀者可以檢視幾種不同，有時甚至是針鋒相對的觀點。它們更新了我們對階級視角的認識，也開闊了我們如何思想香港過去未來的新視界。

羅永生

目錄

題目	作者	頁數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本土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	許寶強	3
香港本土與階級爭論的背景.....	梁文道	11
用階級分析處理文化經驗.....	許寶強	13
本土與左翼——運動連結與民間社會契約.....	蕭裕均	15
界定本土與左翼的問題.....	蘇耀昌	22
主體性中的階級成份.....	蕭裕均	24
梳理本土力量的「內外」關係.....	張少強	25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本土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 [1]》

文/許寶強

2003年「七一」至今，香港的社會運動此起彼落，大學內外的文化研究也逐步普及。然而，也是在這同一個十年，本地的貧富懸殊繼續惡化、政治民主毫無寸進、新聞言論自由倒退、貪腐浮現廉政崩壞、工作生活質素轉劣。如何理解這個對本地社會運動和文化研究可能是最好的年代，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品質和自由平等民主等「核心價值」卻在不斷倒退的年代？

本文以社會運動和文化研究都曾參與建構的「本土主義」為例，把其興起置放在過去十年以至更長時段的政治經濟脈絡中，嘗試疏理回應上述的問題，希望有助我們理解並走出香港社會目前的困局。

本土主義的階級根源

這裏使用的「本土主義」，意指一種強調本土利益、保育本土文化、保衛本土價值的政治取態和行動。例子包括：天星皇后、反高鐵、保衛菜園村和新界東北的本土社會運動和研究工作；「城邦自治」、「蝗蟲論」等針對的主要源自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和文化力量對香港的負面干擾等論述，以至「光復上水」、「反自由行」等抗中排外的集體行動。儘管這些論述和行動的政治光譜伸延甚廣，甚至相互批評攻擊，但仍然共享對「本土」的關注和重視，並以「本土」作為論述和行動的中心，以至或多或少都對中共和九七年後的香港政權不滿及作出抗爭[2]。

然而，這種以文化/地緣族群作為焦點的身份政治，其政治經濟根源，卻在很大程度來自「本土主義」視野往往忽略、甚至嘗試掩蓋或轉移的階級問題，也就是過去三十年全球財富及其資源分配的兩極化趨勢。當中推動的力量，則是所謂「新自由主義」[3]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

這套美國學者大衛哈維(Harvey 2005) 稱為「富人的復仇大計」--嘗試重奪戰後到七十年代在凱恩斯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主導下失去的經濟大餅份額--的「新自由主義」，在過去三十多年間急速擴大了全球性的貧富差距。到了今天，英美等地的貧富懸殊程度，已回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衰退前夕的危機水平。財富的高度集中，令佔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的購買力大升，政治權力不斷積累，連帶提高了其文化的影響力，愈來愈能夠因應他們的慾望、想法和行動，改造城鄉建設、社會政策、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和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戴卓爾夫人等「新自由主義」者所創造的語言概念，在富裕階級不斷增強的經濟和政治實力支撐下，透過大學、智庫、傳媒等機構散播滲透，逐漸成為了社會的共識，甚至迫使「左翼」社群(如英國工黨)也得使用(參閱Zizek 2013)。

深受美國文化影響，並在戴卓爾夫人任內仍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自然難免承接「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而缺乏民主普選的香港，比英美等地顯然更容易滋長劫貧濟富的分配制度，因此成為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也有跡可循。換句話說，

1 許寶強：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文化研究碩士課程主任。著有《告別犬儒續篇》、《告別犬儒》、《資本主義不是什麼》、《限富扶貧》。

今天香港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以至由此催生的社會運動和文化批判，恐怕都有著這「富人的復仇大計」的根源，而以保育本土為目的社會運動，其實也簡接由全球急劇貧富分化(包括中國大陸)、金融地產不斷侵蝕本土資源、文化和歷史所催生。

在「新自由主義」肆虐的年代，量度貧富不均程度的本地堅尼系數由1981年的0.451上升至2001的0.525再上升至2011的0.537[4]。財富集中在最近的十年間不僅沒有改善，更變本加厲。香港過去十年平均每年有4.5%的實質經濟增長，累積了近五成的增幅。然而，本地按固定價格計算的實質工資中位數，卻由2001年的12,380元下跌至2011年的12,000元，10年的實質變化是負2.9%(見統計處《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572012XXXXB0100.pdf>)。當中15歲至24歲的青年，2011年的每月收入中位數與10年前一樣，仍是8,000元(統計處《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青年》，<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632013XXXXB0100.pdf>)，而同期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則上升了12%。換句話說，不久前罷工的碼頭工人所展現過去10年面對的物質生活困境，顯然並非特例。

除了金錢收入外，更重要的階級兩極分化的指標，是其他資源的分配，以至社會地位、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的變化。從2007年的紮鐵工潮到剛過去的碼頭工人罷工，除了爭取工資的合理提升外，還同時明確地向長工時說不，結合近年對最高工時立法的訴求，說明了勞動階層對時間分配的不滿；差不多同一時段，從天星/皇后抗爭到反高鐵保菜園到反地產霸權所指向的，是空間資源使用和分配的傾斜；而反對限制網絡資訊流通、要求增加大學學位和幼兒教育資源的聲音，同時導出了民間對知識資源分配不公的重視。換句話說，時間、空間和知識資源分配上的兩極分化，造成的社會問題及引起的反響，並不下於金錢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導致的問題。此外，統治階級財大之後，氣自然變粗；相反，受宰制排拒的階級，失去的不僅是金錢的回報，更包括社會地位的下降、舊有生活方式的破壞、尊嚴自信的失落。

保衛本土生活和核心價值的各類運動，表面上針對的，是香港以外的「他者」，尤其表現為抗拒中國大陸的族群矛盾。不過，早期的保育本土運動(如天星皇后反高鐵)中所強調的「不遷不拆」，到最近反對在新界東北興建「雙非富豪城」和「港人港地」的提法，亦在在透露出階級矛盾的訊息：誰有能力以西九為基地建立中港兩小時生活圈？或購買本地的豪宅私樓？誰將喪失家園和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間？甚至抗拒中國大陸政權阻礙本地政治民主化的「佔領中環」運動，其實也反映了過去二、三十年階級兩極分化的過程，已差不多擠壓掉了「溫和中產」所重視的價值及生活方式[5]。而「限奶令」、「自由行」所反映的中港矛盾，難道與國內新興中產階級未能在中國大陸獲得滿足其嚮往的中產理想生活，從而衍生出的生存策略無關？當然，這些佔中國大陸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在大國效應下(1%的大陸人口就有一千三百多萬)，對人口只有七百萬的港人生活的影響自然巨大。

階級矛盾如何轉化為排外的本土主義

以當代美國為例，齊澤克(Zizek 2012)嘗試說明階級矛盾為何及如何轉化為排外的民粹政治。他指出，主要以性別和種族議題呈現的「文化戰爭」，其實是被轉置了的階級戰爭。美國的「統治階級」儘管不同意宗教右派的民粹道德訴求，但卻容忍他們發起的「道德戰爭」(例如反墮胎和同性戀)，主要是借此轉移階級矛盾，把下層階級(低收入農民和工人)的不滿，導向別的地方——針對(中產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s)。而在美國鼓吹多元文化的「自由主義者」，儘管表示願意站在低收入階層一邊，但他們強調的婦女權利與種族平等價值，卻往往發放相反的階級訊息——批判被指責為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t)或父權的「低下階層」。吊詭的是，反種族主義和反性別主義追求的是差異的確認，希望不同的文化社群能夠互相尊重

共處，而階級鬥爭所追求的，卻是否定其對立階級的位置，循這角度看，在當代美國，繼承（但轉移了鬥爭目標）傳統左派的階級鬥爭方式的，竟不是站於政治光譜靠左的「自由主義者」，而是極右的民粹主義。

在當代香港，財富和時間、空間、知識等資源兩極分化的影響，導致佔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和缺乏資源的社群，在面對中國大陸龐大的資金和政治力量南下時，往往首當其衝。日常生活直接受到干擾，因此較中上收入和擁有較多資源的社群，更容易滋生排外的情緒。基本上服務於佔產階級的官員和政黨，並不排拒甚至樂意把階級分化的真問題，轉化為對統治階級威脅不大的族群矛盾（例如梁政府樂於推動的「零雙非」、「港人港地」和「限奶令」），而大眾媒體的操作又慣常把問題簡化誇大，再加上瀰漫於社會（尤其是網絡世界）的民粹政治，結果造就了近年以排外（中國大陸）為主調的「本土主義」的坐大。

然而，造成低下階層日常生活備受干擾排擠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來自資源的兩極分化，導致本土的土地、時間和知識等資源，愈來愈集中於服務中港兩地的高中收入階層。例如，商場街舖的改變、新建的私樓、公共交通如高鐵的設計、以至醫療和教育資源的分配，在在都受到掌控政治和經濟資產者所主導，使少數人口佔用了愈來愈多的土地、商品、知識，擠掉本地大多數人的生活空間和選擇^[6]。然而，由於近年這種擠佔的過程，主要以「中港融合」的論述和中國大陸的自由行方式呈現，再加上「本土主義」論述和行動的推動，導致原本帶有強烈階級根源的擠佔本地低下階層生活空間的過程（如高價店舖取代街坊小販），也逐漸被取代轉化為中港族群之間的矛盾。

另一方面，自1989年後蘇聯東歐等共產國家解體，新自由主義當道，再加上近二、三十年強調性別、種族、年齡等身份政治的興起，文化多元主義對階級基要主義持續的批判，令強調資源分配正義的階級政治，逐漸讓位於側重追求被社會認可的差異政治（Fraser 1999），吊詭地與主流的冷戰反共（反文革）論述合流^[7]，客觀上進一步擠壓掉階級話語的空間，同時為「本土主義」的興起，清除了主要的障礙。

貧富懸殊、政治分化、流離失所與社會的自我保衛

隨著財富不斷往中港工商富豪手上集中，部分則流入主要為他們服務的專業中產階層，這些佔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的經濟政治力量也急劇膨脹。權力孕育更大權力，金錢衍生更多金錢，他們影響政府決策，佔用公共資源，改造社會制度，建立不平等的遊戲規則，使大學、傳媒、基建、土地等均向中港富裕階層傾斜。美國經濟學者Paul Krugman及 Robin Wells (2012)分析，經濟的貧富分化會導致政治的兩極化，特別是既得利益的右翼份子將愈趨保守，嘗試阻礙任何不利他們特權的體制改革，甚至視溫和的凱恩斯主義為洪水猛獸，對奧巴馬的醫療改革（其實源自右翼的傳統基金會）也寸步不讓。在香港，經二、三十年的劫貧濟富，羽翼已豐的中港政商階層，也變得更加保守，在政治改革、財富分配等方面錙銖必較，或指鹿為馬以巧言偽術改換普選的定義，或只願意拿出短期的小「甜頭」（如外判商提出的「福利」，或港鐵巴士的「優惠」，以至財政預算的「派糖」），不作長期承擔，更遑論改變分配結構。更甚的是，各種溫和的改革建議和行動，在這些慣享特權者眼中，紛紛化作「激進巨獸」——倡議最低工資「等同」走向「社會主義」或「福利國家」；和平的罷工集會竟被喻作「文革式手法」！

不平等的政經實力，進一步擴大不平等的分配和對邊緣社群身份地位的排拒。由少數中港中上階層掌控或主導的政治影響力及購買力，令不民主的功能團體選舉近30年不變，使住房商舖等「資產」價格高企，壓縮了本地工人百姓的生活空間，窄化

了價值的準則，傷害勞動者的尊嚴，最終引來社會的自我保護——始起起伏的社會運動，保衛本土生活和核心價值。文首所指的本地社會運動和文化研究在過去十年間的勃興，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脈絡下發生的。

香港的情況並非特例，隨着2008年「金融海嘯」徹底暴露了富者（特別是金融機構）享盡了政府干預的好處，但貧者卻被要求「唔該埋單」，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正逐漸轉化成全球性的政治危（轉？）機。由希臘、法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地民眾此起彼落的抗爭，到拉丁美洲左翼政治冒升，到中東的「茉莉花革命」，國際社會正出現了新一輪的反資本主義「階級鬥爭」，彰顯的也是社會中不同社群的自我保衛。

回到香港，社會的貧富階層走向兩極、政府政黨傳媒日趨民粹，逐漸動搖了「中產階級」企圖扮演社會中心的根基；政府、政黨的制度性暴力或街頭抗爭，也令不少處身「中產階級」位置的社群所崇尚的「理性溝通」、「程序公義」、「博愛和平」這些古典自由主義價值變得虛幻。「地產霸權」、「仇富」等（儘管不太精確的）說法的湧現，反映了民衆針對官商階級的情緒。在這樣的社會轉型下，去年「七一」遊行隊伍中，又再出現了久違的「階級鬥爭」旗幟，揮舞者是一群年輕人[8]。

不過，「階級鬥爭」的提法，並沒有成為本地社會的論述的主要關鍵詞，甚至很快就被輿論遺忘。除了因為上述的階級矛盾被「本土主義」吸納轉化外，還可能由於這種缺乏中介的「階級鬥爭」提法，並未能擺脫以往帶經濟決定論的階級基要主義的陰影，也就是沒法把經濟不平等和剝削關係，與文化身份政治所強調的族群、性別、生態保育等同屬社會自我保護的關懷扣連。然而，儘管「階級鬥爭」不易言說，但面對佔產者對無產者共享的資源的掠奪不斷升級，擁有政治及文化宰制權者對邊緣社群的排拒及無視，階級視野顯然並非可有可無。因此，要理解香港社會近年的轉變，尤其是政治危機和相伴的社會矛盾的激化和社會自我保衛的興起，恐怕必須尋找合適的話語，直面日益明顯的階級對立[9]。

新時代的階級分析

一直以來，「階級」主要被理解為依據收入水平或不同職業劃分的社會位置，例如高收入的社群或金融地產等大企業CEO被界定為資產階級、中收入或專業白領行政是中產階級、低收入或「打工仔」則是無產階級。然而，這種根據社會位置劃分階級的做法，並不能有助我們理解不同社群的政治（或反政治）取態。例如，為甚麼中小企業組織會比大企業更反對「公平競爭法」？又或為何低收入的「打工仔」會投票予偏幫官商的「建制派」？因此，要理解香港社會轉型中的政治危機，需要重新思考「階級」的定義。

本文所提出的「階級」，其界定劃分的方式，並不僅包括狹義的經濟利益（如收入）或職業地位，而是同時包含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過去的階級分析側重於經濟剝削和物質利益，缺乏對生活品質和文化價值爭持的重視，這是十分狹隘甚至是錯誤的。正如波蘭尼指出，「一個階級的利益最直接地是指身份(standing) 和等級(rank)、地位和安全，也就是說，它們首先是社會性的而不是經濟性的」(波蘭尼2001：頁131，下只標示頁數)，而「金錢利益也是與非金錢利益不可分割的」(132)，社會的災難也「首先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不是經濟現象...導致退化和淪落的原因...是被犧牲者文化環境的解體...後果是其自尊和水準(standard) 的丟失，不論其單位是一個民族還是一個階級」[10](134)。波蘭尼所指的文化及社會生活的流離失所，包括「手藝被荒廢」、「生存的社會和政治條件被破壞」(135)，因此才有社會自我保護的廣泛性，「最終，正是一個階級與社會整體的關係決定了它在歷史中

扮演的角色；它的成功是由它能夠為之服務的利益的廣泛性和多樣性，而不是它自身的利益所決定的。實際上，只關注一個階級的狹隘利益的政策甚至不能護衛這種利益本身」(133)。循這思路，香港過去十年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和文化批判，也就是波蘭尼所指的社會自我保護，這並非建基於狹義的階級經濟利益，而是源自「新自由主義」對整體的社會生活和文化價值的破壞。

波蘭尼同時提醒我們，階級是變動不居的，這個觀點，在當代社會得到了迴響。J.K.Gibson-Graham等學者(2000)提出，「階級」是一個佔用和分配資源的過程，而非根據先驗的社會位置來劃分。換句話說，決定一個人或社群屬於哪一個階級，主要取決於他或他們在其置身的資源分配過程中，是更多（或更少）地佔用了社會和自然資源，還是遭排拒或剝削。因此，同時擁有物業或其他資產（包括港人身份）以收取由此帶來的租值（rent）的「打工仔」，恐怕不一定會採用激進的「無產階級」政治取態。

齊澤克(Zizek 2010)進一步指出，當代政治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對文化資源、自然生態和生物基因的新「圈地運動」，也就是透過知識產權專利、私有化原本由公眾共享的土地、水、石油、森林等自然資源及動植物體內的生物基因，催生了新一輪的無產階級化過程——逐漸把大部分民衆原先擁有或共享的文化資源、自然生態和生物基因掠奪，使他們變成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因此，當代的階級應根據對文化資源、自然生態和生物基因的佔有或被排拒而劃分，歸類為「被選中者」(Included)和「被排拒者」(Excluded)兩種階級。齊澤克認為，新的「圈地運動」(或把文化資源、自然生態和生物基因等資源私有化的過程)，並非是根據你情我願的自由買賣邏輯操作，而是依賴法律或軍事等強制手段，製造壟斷性的地租，並借此而佔用各類自然與文化資源。例如，掌控私人電腦標準操作平台軟件的微軟公司，或獨享知識產權的專利持有者，又或港人熟悉的大地產發展商，主要並非依靠降低生產成本來增加利潤，而是透過建立或進駐壟斷的位置，收取廣義的租值，佔用自然和文化資源的最大份額。這也是「被選中者」(或「佔產階級」)對「被排拒者」(「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也是造成當代政治危機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扭轉社會兩極分化和由此引起的政治危機，「被排拒者」有必要針對擁有壟斷特權的「被選中者」進行抗爭。

共享的鬥爭：讓「本土」回歸「階級」

齊澤克認為，當代社會的「無產階級」主要包含三類社群——知識工作者、勞動工人和邊緣族群（例如失業者或新移民），他們都同樣面對因「被選中者」（圈地者）的不斷佔用文化和自然資源而失去過去能共享的公共空間。困難的是，在窄隘的身份政治影響下，三類主要的「被排拒」者之間，往往未能團結對抗被選中的「佔產階級」，甚至相互排斥，例如知識工作者對勞工階層和邊緣族群的文化偏見，勞動工人也經常不滿知識分子和邊緣族群；而在這樣的不友善環境下，邊緣族群自然也不會對知識分子和勞動工人產生好感。因此，齊澤克相信，如果能夠讓全世界「被排拒者」(「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已經是走向一個更平等和公義社會的「階級鬥爭」過程中的重大勝利。

循齊澤克的思路，我們不難理解，為甚麼政治的鬥爭並不在於爭奪政府的權力（例如誰當特首），而在於改造政權和政體的運作，使它有利於更平等和公正地分配自然和文化資源。為此，我們需要改造那種建基於不同社會位置的身份政治（例如本土vs外族），避免進一步分化「被排拒者」，而應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針對造成政治危機的源頭，創造新的或「活化」舊的政治（階級及本土）語言，提出有理解釋和建設性地處理社會矛盾的論述，在「被選中者」(「佔產階級」)和「被排拒者」

(「無產階級」) 兩極分化愈來愈明顯的社會現實下，直面及認真分析已經不能再迴避或遮掩的「階級鬥爭」。

一個可資參考的分析進路，是馬國明對「本土」的定義。他認為，「本土」其實產生自升斗市民的日常生活，回歸「本土」就是「與被壓迫的祖先相認」。循這思路，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被壓迫的「祖先」，就是在不同時代受既得利益社群或財權佔有者欺壓或排拒的香港老百姓；「被壓迫」則包括了物質生活、社會地位和文化價值的流離失所；與他們「相認」，除了指情感的回歸，還包括站於雞蛋而非高牆一方的階級認同，以至直面階級矛盾而非轉移為族群對立、鼓吹排外政治的清醒「認」識。

此外，Fraser (1999)提出的不要把分配 (redistribution) 與確認 (recognition) 的政治鬥爭截然分割，也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的視野。她認為，所有的階級矛盾 (分配政治) 與身份差異 (確認政治) 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因此問題不是要二選其一，而是以平等的參與機會 (parity of participation)，統合兩者。而在當代香港，本土及性別等身份政治如日方中，階級視野備受壓抑的社會脈絡，我們或有必要以非基要主義的方式和態度^[11]，相對地強調分配政治的重要性。

歐洲上世初的文明危機 (大衰退和兩次大戰)，正如波蘭尼指出，根源自「放任主義」 (舊版的「新自由主義」?) 所鼓吹的激進意識形態和社會分配政策，對人類生活和自然生態產生了極大的破壞，導致各種形式的流離失所，催生了環保、工運、政改等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儘管這些社運看來分散，但其實來自同一源頭。他沒有討論的，是怎樣令這些不同運動更有效地針對這同一源頭，而非各自為戰，甚至相互抵消。這正是我們今天面對類似的困局時，需要認真考慮的。

參考書目：

Douzinas, Costas and Slavoj Zizek (2010): "Introduction: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Costas Douzinas and Slavoj Ziz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Fraser, Nancy (1999):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Identity Politics: Redistribution,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Larry Ray and Andrew Sayer eds. *Culture and Economy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p.25-52.

Gibson-Graham, J.K., Stephen A. Resnick and Richard D. Wolff (2000): "Introduction: Class in a Poststructuralist Frame," in J.K. Gibson-Graham, Stephen A. Resnick and Richard D. Wolff eds. *Class and Its Other*,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rossberg, Lawrence (2010): "Considering Value: Rescuing Economies from Economists," in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2005) :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rugman, Paul and Robin Wells (2012): "The Widening Gyre: Inequality, Polarization, and the Crisis," in Janet Byrne ed. *The Occupy Handbook*, NY: Back Bay Books, pp.7-17.

Polanyi, Karl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MA : Beacon Press. (中譯：波蘭尼 2001，〈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馮鋼、劉陽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Zizek, Slavoj (2010): "How to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 in Costas Douzinas and Slavoj Ziz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Zizek, Slavoj (2012): *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Zizek, Slavoj (2013): "The simple courage of decision: a leftist tribute to Thatcher," *NewStatesman*, 17-4-2013, <http://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politics/2013/04/simple-courage-decision-leftist-tribute-thatcher>.

許寶強(2012)：〈文化經濟學與情緒政治——否想香港的新自由資本主義〉，未刊稿。

[1] 本文的部分段落，引用或改寫自筆者〈罷工、佔中與本土運動的政經根源〉，《明報》，2013年4月22日和〈如何理解香港的政治危機？〉，《明報》，2011年7月25日。

[2] 儘管涵蓋甚廣，但近年影響最大的，恐怕是充滿排外(中國大陸)情緒的「本土主義」。因此本文著墨較多的，也主要是這種本土情緒政治。

[3] 在「新自由主義」之前加上「所謂」，目的是說明這套興起於上世紀80年代，以小政府大市場、私有化(privatisation)、去規管化(deregulation)為名的意識形態，實際是選擇性地透過劇減利得稅支持大企業(如軍事工業)，同時又不斷打擊工會、壓抑福利的一套劫貧濟富政策，因此與一般人所理解以至重視的「自由」(包括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自由)，其實拉不上任何關係，甚至可說是自由的反面。更詳細的討論，見許寶強(2012)。

[4] 中國大陸也有類似的趨勢，至今這個仍自詡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其貧富不均程度甚至超越歐美等「資本主義」地區，難道不是說明了，中國大陸自1980年代全面推展的「改革開放」，實質與英美同期鋪開的「新自由主義」，有點異曲同工嗎？

[5] 曾俊華的「中產論」之所以惹來這麼大的反彈，恐怕與不少本地的「中產階級」再(或從來?)無法享受財爺眼中的理想「中產」生活有關。

[6] 具體表現為：以連鎖店為主的商場取代了小販和屋村的街道店舖，商業中心的街道店舖則轉化成金舖、藥行、化妝品店、或電器零售，擠掉了過去主要為街坊和本地低收入百姓服務的食肆和商舖，同時擠掉了他們以往能夠享有的相對優質和有選擇的自由生活。

[7] 「階級鬥爭」這詞，在過去或直至現在的香港，存在一種不証自明的共識，就是把它與非理性、極端激進、殘暴混亂等負面形容詞掛鉤，這也許與港人對強調「千

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或想像有關。因此，在香港很難公開地以「階級」扣連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問題，除了去政治化的階級話語。於是，過去十多二十年，有關「階級」的主導論述，是「中產階級分析」。

[8] 「階級鬥爭」旗幟於公共領域的再現，在相對保守和追求安定的香港，惹來了各方評擊自是意料中事。有趣的是，有關的批評大多只是引用文革的「集體記憶(或想像)」，扣連恐懼的政治，無需說理，只一再重覆「忘記了文革血的歷史嗎？」這嘲諷式老調，嘗試把「階級鬥爭」的提法消音。這除了無助我們理解「階級鬥爭」的口號為何會再次在本地公共論述中出場，也同時說明了禁制「階級鬥爭」話語，仍然在香港佔據着統治性的共識。

[9] 僅使用波蘭尼所指的「社會自我保衛」，無法突顯當代危機的階級兩極分化根源，也相對容易被排外的「本土主義」收編。

[10] 他以19世紀印度為例，指出問題不在於經濟剝削，而在於激進的自由經濟烏托邦破壞了當地舊有的共同體，但卻未能為平民百姓提供新的保護方式，結果導致大饑荒。類似的是，香港最近的碼頭工友的罷工，自然與工資待遇有關，但工友重視的還包括「爭番啖氣」。短短二十多天就籌集到數百萬的罷工基金，得到公眾的廣泛同情，顯然還基於工友所面對的不那麼人道的吃喝拉睡生活和工作方式，以至對平等、義氣和尊嚴等價值觀念的重視。而在佔中與本土運動當中，基於不同階級的不同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所產生的矛盾，例如特權vs普選、增長vs保育，更是昭然明瞭。換句話說，階級矛盾指的是：既得利益社群或財權佔有者對被排擠或不佔權產者的欺壓，包括經濟利益的剝削、政治權利的排拒、生活方式的改造，以至價值觀念的強加，最終令後者在物質和精神生活上流離失所，無法依自己的意願安居樂業。

[11] Grossberg(2010)指出，在當代社會到處浮現的基要主義，基本上是一種價值的負經濟(a negative economy of value)，也就是想全盤否定甚至滅絕他者之價值，而非像過去一樣僅建立一種劃分價值的等級。因此，當代政治的主要戰場，不在於在既有的價值坐標下追求再分配，而是爭奪界定甚麼是有價值的；而當代的危機，也主要體現於判斷和比較價值的危機(crises of commensuration)。面對這新的危機，他認為我們需要建立既能確認他者差異的價值、又不致普同化所有價值的比較價值的邏輯，一種非基要主義的邏輯。(Grossberg 2010: 160-168)

《香港本土與階級爭論的背景》

評論人：梁文道（標題為編輯所加）

為了突顯《本土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一文的意義及啟示，我嘗試為這篇文章再提供一些背景：首先第一個背景是香港最近出現了很多關於本土的爭論，最為顯著的是來自本地社運界內部。如果我們使用最簡單、流行的語言來形容，就是「本土派 V.S. 左膠」的爭論了，我不再為「左膠」一詞作一個仔細的定義，因為相信大家對「左膠」已有一定的了解。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翻譯為一個較學術的語言，亦即是許寶強所引述 Nancy Fraser 有關 Redistribution 以及 Recognition 之間的辯論。當我們嘗試判斷香港的問題時，香港主要是屬於哪一個類型的問題呢？是 recognition 的問題，即是一個文化身份上的認同、身份不被承認、或是身份被打壓的問題？還是經濟、利益或是階級上再分配的問題呢？哪一個層面才是真正的問題？哪一個層面的分析是可以吸納及涵蓋到另一個層面的問題。我想這是當前我們所面對其中一個的爭論的背景。

第二個背景還牽涉很多如自由行，或是香港租金不停上漲等問題，其實最近香港發生的大型社會運動亦浮現了這些討論，只是這些爭論未必與所謂的中國的存在或是中國的壓力直接相關。例如前一陣子剛結束的碼頭工人罷工事件，或是現時大家正在討論的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及直資學校的教育資源分配問題，這些問題都不是直接與中國問題或是中港矛盾拉上關係，我們又應該如何去判斷這一些問題？我們可否從這些爭論中提煉出一個框架，把這一組問題都吸納在內並給予一個統合的分析和掌握呢？我想嘗試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來開始看一下許寶強這一篇文章。

首先，許寶強表面上提出一些本土政治、本土主義的問題，但實際上他的文章亦講得十分清楚，本土主義只是作為一個例子用來說明香港的一個社會政治經濟的困局，而本土主義便是這個困局下所產生的病徵。這個病徵是甚麼？先來斷症的是本土主義：這個本土主義其實包含很廣，例如大家都剛才所提及到的最近陳允中所區分的「開放、真正本土派」和「土著派」。其實本土……是很多種的。究竟這些本土的分別是在哪裡？許寶強沒有很著力嘗試作一個分析及光譜上的定位。

許寶強指出有一些本土行動有時候會牽涉到階級利益的照顧，有一種左翼的關懷在內，但亦有一些本土行動是沒有的；但他嘗試指出不論是哪種本土，也很有可能沒有問題。本土的問題在哪裡？他借用了齊澤克的分析，去了解美國這一個近年新自由主義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下發生的一個問題：為甚麼在美國或是歐洲等地區，最支持他們或是最擁護右翼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往往是一些我們認為是身受其害的低下階層？其中一種解釋是，由於今時的右翼綁架了或是利用了一種民粹主義，呼召一些文化上、身份上或是宗教上的一些價值，而那一些東西是有說服力的。在這個情況下，美國的 Liberals 或是比較稍為中間偏左的一種看法，他們是沒有辦法解決或是沒有辦法有效地回應到這種右翼對於文化的、身份的、宗教的、種族的... 這一些身份符號的利用，他們無法作一個有效的回應。

這就是許寶強嘗試用來了解今日香港的這個本土主義的興起背後的問題所在。當然我們會預期到許寶強所提及的替代出路便是階級，但如何把剛才的問題轉回階級問題？最近幾十年大家對「階級」一詞有太多的爭論：我們所說的階級有什麼意義？

梁文道：資深傳媒人及文化評論人，十多年來他寫過政治、文學、藝術、書評及樂評，但他最想寫的其實一直都是飲食。

階級是不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下的階級？在這裡許寶強較為側重使用波蘭尼，波蘭尼所指的階級是一個文化和社會現象，多於是一個經濟現象為先的狀態。

許寶強再建議我們嘗試用一個更擴大、已過程化，甚至已改變的階級框架，去理解今天香港本土中所提及的所有看法，例如是本來所擁有或是所享有的某些價值或是利益被剝奪了、被拿走了。這一些是被壓迫階級，而這些被壓迫的階級的定義或是所包含的範圍，不單是傳統下所謂的經濟上有產及無產的劃分，而且還包括了在文化資源和時間資源擁佔上，各種資源的擁佔和分配上都是處於一個被剝奪的、被排除的位置，而這個階級才是一個我們真正需要關注的階級。

最後許寶強在結論中呼應馬國明對本土的定義；我們應該把本土看作是被壓迫的祖先相認，然後把剛才所提及的這些階級，與本土等同起來。如果本土所指的本土便是與被壓迫的祖先相認，而所謂階級便是被剝奪的階級，是在各種的經濟文化的社會資源上，都被排除、被剝奪的人。於是，左翼和本土派，似是可以找到一個交匯的地方，化解這個問題。

我覺得許寶強這篇文章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文章，這對於我們如何看待當時的問題或是如何處理什麼問題。但是他當中有兩點，我覺得還是未能夠很準確或是很全面地可作回應，可能這篇文章是一個較為高理性的文章。第一點便是關於中國的存在或是中國大陸的存在；如果我們今天要解決香港所要面對或是要處理種種問題的時候，例如很多的商店的租金不斷上升，然後使現時很多報紙雜誌社所提及、市民所十分熟悉，有數十年歷史的店舖倒閉，取而代之的是莎莎或是米蘭站等。大家都認為有很多問題，是很不妥的。這個情況是一個怎樣的問題？按照許寶強的說法，是稱之為階級問題。但是，我們需要明白的，許寶強的文章好像也曾提及到現時有很多自由行，或是來購買奶粉、樓房的人，他們是一些內地的中上層階級，而這一些人是有一套關於好的生活的理解或想像，他們來香港是他們生存策略的一部份。我們又如何處理他們這一班人？當我們把鬥爭的焦點放在香港：例如我們先解決階級的問題，或是我們不要把整件事不要變得太簡單化、排外。但是，這個運動又能否只能局限於本地？因為我們同時需要間接面對的問題，便是中國大陸內部自己也有了一個階級矛盾，那一部份又應如何處理？這兩部份並不能輕易地劃分，因為內地現在亦很多來不了香港的那一些人，他便是一個被排除的人，而可以來香港的那一些內地人，其實我們也很難把他們歸類為既得利益者。所以那一班人是甚麼階級屬性？而那個鬥爭是否應該要有一個串連兩地的可能或視野，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是許寶強這篇文章沒有提及，亦是很多時我們的左翼派朋友都較為少去談及的問題。因為土著派有一個十分明確的打擊對象，無論那個打擊對象是想象的還是真實的也好，便是一個中國，而那種東西不論是在情緒上的呼召力亦是較強的，以及它有一個十分實質的存在，有一種鬥爭策略，是會較為完整的，所以我想這個可能需要大家再看看。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用階級分析處理文化經驗》

回應人：許寶強（標題為編輯所加）

讓我從一些個人在書寫這個主題時的想法開始。在寫這篇文章時，我在想要否加一個大題或副題，叫做「千萬不要忘記階級……」，但沒有想好應該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還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文章寫完之後，發覺比較多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這是因為想幫馬國明那個「本土是向受壓迫的祖先相認」的說法做一個註腳，因為我覺得他這個說法十分重要。但這個「與受壓迫的祖先相認」的說法，我認為暫時並沒有更仔細地展開，而我這篇文有一點兒觸及到，雖然亦沒有很仔細地展開討論，但我覺得我們之後可以用這個說法來統合本土論述和階級論述之間的一致性，或者是看看有沒有新的提法。

「被壓迫的祖先」的「被壓迫」，很明顯是在一個層級上、權力上的不平等關係裡面，而「本土」這個概念是沒有包含這種意思的。例如在兩個國家實力對等的情況下，你仍然可以談本土或者排外，但「被壓迫」卻有權力不平等的意涵。我所謂的階級，其實也就是針對這個意思，所以與Polanyi稍為有一點不同的是，我嘗試補充他所用的「社會自我保護」這概念，其實也是加入了這一種不對等權力、不對等資源分配的意涵。而也就是在這個意思上，我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的看法。

另外一個原因，與羅永生在上一期對泛左翼的評論相關，就是對文化經驗的輕視。我覺得，我們的文化經驗其實正在變化，而文化經驗也不只是一種，因為經驗亦有階級性。譬如新移民與自由行來港的人，兩種所謂「非本土社群」的文化經驗是很不同的；而香港人感受到他們的文化經驗，也是不同的。這裡很明顯有階級性，新移民很多是從農村中出來的一些階級背景底下的社群，容易感受到那種排外的本土主義下的壓力，那種壓力是無處不在的。

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階級仍然很難言說。不過，今天談論階級分化，已沒有以往冷戰高峰期那麼困難，剛才梁文道補充那幾點，譬如罷工、最低工時等等，報紙都可以寫上「階級鬥爭」，這些都不再完全是洪水猛獸。原因其實很簡單，是因為整個社會環境的兩極分化，已去到一個不可能不直視的地步。所以我覺得本土主義強調的那些族群矛盾被誇張了，我的意思就是，本土主義之所以能吸引那麼多的眼球，其實可能與我們談論得太多也有關係。這裡是我對本土主義的一點保留，我認為無論排外或開放的本土派，也參與了這種本土論述的建構過程，當然，也要考慮到可能一些不經意間產生的效果。

所以，回答梁文道的問題，我是完全同意中國的存在是至關重要的，需要認真討論，我的文章也稍為觸及這點，譬如對大陸中產階級的生存策略的處理，但沒有展開討論。整篇文章其實都是召喚一個新的思考角度，就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或者視野，用來作為本土論述以外的另一種分析角度。循著這思路，下一步就是做中國與香港的階級分析，因為用階級這個概念，去分析我們這個社會困局的時候，就不可能局限於特定的地域之內，這是不可能的。今天早上我們談及國際主義這個問題，儘管我們不必一定要用國際主義這個概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階級這概念不是地域性的。

我們不單沒有展開對中國大陸的階級分析，對香港的階級分析亦未曾展開。例如，香港的資產階級有很多種的，資產階級可能愈走愈近香港的本土，這是什麼意思？其實不是十分清晰的。如果我們用的階級語言，基本仍然是以經濟利益為主的一種語言，我覺得並不有助我們認清當前的社會局勢。所以我的文章想開展另一種階級話語，就是不以經濟位置、經濟利益為中心的語言去談階級。階級是一個有關資源

分配的過程，如果它是一個過程的話，在香港與中移動競爭的一些企業或階級，它們在這個過程裡面可能是被排拒的，因此和另一些被排拒的階級有可能結盟。而在下一個階段，當新的矛盾出現的時候，將是另一回事。我的意思是，這樣看待階級的話，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社會的重要矛盾。這就是我整篇文章嘗試做的工作。

面對現在的新形勢，我初步的總結有三點。第一是重提階級分析，是可以有豐富的文化經驗支撐的；第二，亦可借用一些新的階級語言幫助我們分析這些經驗；第三就是本土主義對階級矛盾的置換(displacement)。我所說的置換，是指香港當代社會矛盾的政治經濟根源，其實是在很大程度上與階級兩極分化相關。這本來是很明顯的事情，例如自由行買光了奶粉等問題，其政治經濟根源都與中港兩地的階級分化有關。正如我在文章中指出，階級的意義是很闊的，而為什麼仍然會被本土主義置換成為只剩中港矛盾？

其實不必然是這樣的，這是各種長期的政治與情感投資的結果。即是說，這不是一個客觀上必然出現的關係，例如說見到一個中國大陸遊客引起的問題就比較容易扣連上中港矛盾，我覺得不能接受這種解釋。問題應聚焦於各種政治與情感投資是如何操作和產生成效的，而這種投資的過程裡面，各種不同立場的本土論述，是否也參與了促成本土主義的坐大？又或者是否一定要從本土主義設定的議題裡面進入討論？這樣做的話，會否鞏固了本土主義這一種話語成為一個主導的問題意識？

不過，齊澤克在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一書的其中一個提法，儘管我不是完全同意，但我覺得很有趣，很值得討論。他的提法是，我們不要做太多東西，在這個世代，不要因為見到很多東西很混亂，就一定要快速做一些回應，甚至不要反抗(resist)。他說現在對整個制度的最根本的抗爭，就不要趕著去反抗，這不等同甚麼也不做(inaction)的意思，因為在當前的社會氛圍中，要不趕忙作出反抗，其實本身已是一個需花不少力氣的行動(action)，是要花很多時間和心力去做的。我覺得這觀點很有趣，提出來讓大家可以討論一下，也許這也是一個另類的「政治大計」。總的來說，我暫時是沒有政治大計的，不過我想大家都不要那麼快有。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本土與左翼——運動連結與民間社會契約*》

文/蕭裕均

我想先說一下這篇文章為什麼會出現。我是從運動裡開始思考，特別是反高鐵以後，我的感受是一個由零三年的七一的運動形式到達了一個高峰，以後便直接掉落到一個低點。甚至我們越來越困難地解釋每次運動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形態。人們為什麼會走出來？而走出來的人又是怎樣的？特別是反國教的時候會碰到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那十二萬人的數字到底說明了什麼？然後，從反國教開始，又多了很多其他的不同行動，例如耕田，或平等分享機會等。而我感到很困擾的是，這些行動如果真的是覺醒的話，那覺醒之前的是什麼。如果現在已覺醒，那未來豈不是不用覺醒了？當我們說「覺醒」的時候，是在說它的量還是質？這有了幾個問題，我們便來進入這篇文章。

我嘗試尋找一些理論以及觀察這個「覺醒」過程，我覺得這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得更清楚。七一十周年我們談及有關本土的問題，而我所想要提出的，是一個關於時間的問題。近年不論是社運或是其他方面，我們會談很多空間，例如，空間的戰爭，特別是在談中港融合時。我不會完全否定這些空間鬥爭中所產生的意義和價值，但我們好像少了一個時間上的渠道來思考這些東西。而對空間上的鬥爭，我們也背負着一種不斷覺醒的困惑。不斷覺醒，不斷焦慮；不斷覺醒，不斷抑鬱。而這種精神狀態的背後，會不會是我們希望一刀了斷，或者是希望能找到一個political project，即是我們能夠提出來一個問題，然後解決，例如佔中。但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是等不及的，或是會感覺不耐煩，覺得應該有一個結論總結出來，便是剛才蕭裕均所提及的線性的歷史。

我嘗試提出另一種時間的想像，便是一種阿甘本的時間想像。這種時間想像是完全與這個political project無關的。基本上，人們是不會思想這種東西，所以便是means without ends。即是指對未來的想像，並非是一種對明日世界終結時的一種想像，而是一種我們正在面對的一種發展主義的傾向或軌跡，然後開展另一套新的時間觀念出來。即是他（阿甘本）嘗試回歸一個對時間的想像，而那種想像是一種potential，並非一種很快的，我們所想像的線性發展的那一種想像。

阿甘本曾提及一種說法，引用一個語言學家。他說，時間是什麼？時間便是一個意識、一種感受。即是我們有一個sense of time這樣的一個東西，但一路發展下來時，本來是需要空間這個concept把它表徵下來。而這裡所說的是一個時間線，一點一線。從這種表象到這種感受，阿甘本嘗試提出：這是不充足的。雖然它是很美，由一點到另一點，發展主義便是這樣的想法，由一點到另一點，做得不好時也不要緊。我想要提出的是，這種線性是有問題的，阿甘本想要把這個問題變得複雜起來，就是把一個two dimension變為一種three dimension的東西，三維的東西。而這個三維是什麼？其實是一個兩極，即是一種bi-polar的想法，而不是一種兩極化，如現時所說的中港矛盾。如南極、北極一樣，它們之間產生一個磁場，是一個物理學的理論。在這個理論裡，便有一種新的對運動、對個體的想法。阿甘本嘗試說運動，運動是什麼？是movement，movement其實是一個人民的apolitical的一些活動。而阿甘本想說，我們需要回到一個potential的脈絡中，簡單來說，在這些定義以前，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這種狀態並非是一種一跳便會作為一個敵對的狀

蕭裕均：勞工及青年研究學者。香港中文大學兼任講師。澳洲國立大學博士候選人。左翼運動成員，多次在香港組織《資本論》研習小組。現任圓桌出版（香港社會及文化系列）編輯。

態、一種二元對立的狀態。阿甘本亦在這樣的一個思辯的過程中，嘗試提出一個例外狀態。

什麼是例外狀態？這個有一些學者如羅永生教授在早前有一篇較短的評論裏曾經引用過。阿甘本所提出的例外狀態，其實在Carl Schmitt與Walter Benjamin的討論裡就出現了。其中一個論點是，當把所有的例外狀態變成rules的時候，即是其可運作並成為一種常態的時候。而當我把這種狀態放於香港零三年七一以後，即是中共隨時能夠插手香港的事情，並能夠說出中央的立場。而這個，我認為是一個例外，而這種例外狀態一直圍繞著我們每一個香港人。所以我們現在便會想，中國大陸是什麼樣的，大陸是想怎樣等等，這種威脅成為我們今天的一些矛盾。

我們回到因果關係的因上。對一種關係的重新思考，我認為是頗為有用的方法。我認為我的文章並不是真的想要提供一個political project，相反，在一個思辯的過程中，我認為當中有些地方可能是技術上的，我們可以重新再作一個微調，然後再思考一些本港的問題。

過去十年，香港社會迅速地被中國化和新自由主義化。與此同時，香港的公民社會亦出現抗衡這些趨勢的力量。這邊廂，不同的保育運動促使「本土」力量抬頭；那邊廂，隨著地產資本和金融資本的霸權越形鮮明，以「左翼」之名而聚合的力量亦同時出現。然而，兩股力量雖先後在十年間湧現，卻不單未見交集，更出現互相攻擊和對立的局面。

這樣互相攻擊的局面自2011年政府派六千蚊、外傭居港權，以至2012年的雙非問題，已令「新本土意識」所引發的問題和論爭上升至一個不能不處理的階段。有趣的是，論爭一度離奇地發展成：你罵我是「本土 = 右翼 = 希特拉 = 排外」；我罵你是「左翼 = 幼稚 = 世界大同 = 只談階級 = 為虎作倀」。

無疑，這樣的論爭不單進一步激發香港社運圈內的矛盾，更無助推動真正的進步本土文化運動。有見及此，本文嘗試從運動扣連和可行共同發展議題上入手，提出相關問題及分析，望能使討論焦點回歸進步運動議題上。

本文重點探討的問題如下：（一）各種以「本土」和「左翼」為名的社會力量有何不同？（二）一種揉合本土和左翼的分析和運動議題是否可能呢？即「進步本土左翼」可能嗎？（三）如果可能，進步本土左翼應朝什麼社會願景和目標進發？如何成立新社會契約以取替過往由政府單方面成立的社會契約呢？

本文主要論點是：現時有必要整合香港社運圈內的進步力量，並展開制定以民間社會為基礎的新社會契約，以取替過往單向而且缺乏合法性的舊社會契約。

一、「保守本土力量 VS 進步本土力量」及「左翼經濟論 VS 左翼關係論」

首先，我認為有必要把因本土意識而衍生出來的兩股社會勢力進行分類。我沒有很好的詞彙，但從不同的事件中（如政府派六千蚊、外傭事件和D&G事件，以及過去幾年不同的本土保育和反移山填海運動），我們可以約略分辨出兩股不同，但又同時強調「本土」的社會力量。我姑且分別叫他們為「保守本土力量」和「進步本土力量」：前者多排外姿態來設定議題；後者則以提倡在地文化和集體經驗來建構本土身份。

在分辨保守和進步的本土力量，沒有比葉蔭聰在探討本土意識時對二者作出的描述和分析來得更恰當。葉指出，現時具強烈排外的本土意識其實是承襲了過去的「大香港主義」和對香港的「物化」想像而來的：

「事實上，由1970-80年代所形成的『大香港主義』，並沒有消失。可能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這種本土認同少了幾分自傲，多了幾分排斥與恐懼，扣連上不同論述。……排外的香港地緣認同及意識，在近年許多議題上持續發酵，例如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爭議等等。」（葉蔭聰，〈香港新本土論述的自我批判意識〉，《思潮》，第19期，頁114）

對於有別於過去「大香港主義」的進步本土力量，葉有這樣的描述：

「跟過去的本土意識中的『大香港』心態不同，所謂『本土』不是與中國的文化或政治對抗，而是對抗香港自身的經濟力量，反抗政府主導或鼓勵的、資本主義式房地產發展，反對的對象通常是大型拆遷、地產發展的空間改造，以資本增值為目標。……本土論述並不預設一個香港以外的他者作為批判對象，而是對香港自身歷史及政經構成的自我批判。」（葉蔭聰，〈香港新本土論述的自我批判意識〉，《思潮》，第19期，頁110-1）

至於所謂本地「左翼」，無疑又是一個籠統的詞彙。要指出的是，所謂的左翼也不是鐵板一塊，當中也有其混雜性。內裡當然有單純以經濟或階級角度出發，而忽略其他文化和社會因素的群體。但在本地左翼內，也有很多雖然強調（注意，是「強調」，不是「單純以」）階級的視野，但卻同時會把本土文化和社會等因素作考量點的人士。在劃分這兩個群體上，我也沒有很好的詞彙，又姑且把前者叫為「左翼經濟論者」；而把後者稱為「左翼關係論者（Relational Leftist）」〔註1〕。

劃分雖然十分粗糙，但是重要的。由於要展開運動圈內特定群體的對話，我們需要有明確的對話群體。我此文希望做到的，就是能促進「進步本土力量」和「左翼關係論者」間的良好溝通和互動。經上述粗略的劃分，「進步本土力量」更可以擺脫「本土戀物／拜物主義（Fetishism of the local）」的指責，更清晰地把自己的運動議題設定得更批判和自省（如對權力、權利、公民身份，以至保守本土力量的批判）。這種自我批判亦能有助進步本土力量認真地應付許多利用「本土」的措詞和論述來主張不同的右翼民粹勢力。

另外，「左翼關係論者」亦可以擺脫「階級戀物／拜物主義（Fetishism of class）」的指責，進一步把資本在文化層面的運作有更深入批判，亦可對單純以經濟角度作考量點的左翼經濟論者作出鞭撻。更重要的是，那一系列只有污名化作用而無助討論的恒等式（「本土 = 右翼 = 希特拉 = 排外」；「左翼 = 幼稚 = 世界大同 = 只談階級 = 為虎作倀」）便能得以消解，而進步力量之間的互動便能以展開。

在定義運動圈內的兩個對話群體後，我們便看看「進步本土力量」和「左翼關係論者」各自的主要敵人，以及這些敵人在香港不同層面（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影響。這分析目的在於勾勒出二個群體之間的共通點，從而定位一個可行的共同運動方向。

無論怎樣，我們也得承認「左翼關係論者」始終以強調「資本」作為他們的針對目標和主要敵人。但另一方面，「進步本土力量」的敵人是較難找到的。有時候他們的目標是新自由主義，有時候是（後）殖民主義，有時候是威權主義，有時候是中國化，有時候是世界化。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進步本土力量」的議題設定多是防衛式的，很難有一個十分明確的針對目標，能定位的就可能是每一場在地抗爭中對獨特本土文化、集體經驗、和本土價值的維護。

經過上述尋找敵人的分析，我們也不難看到為何「進步本土力量」會這麼容易被污名化為排外勢力之一。其中一個很大原因是「進步本土力量」本身也是以保留一系列十分具彈性的文化、經驗和價值作為抗爭目標。但細心分析，便會看出進步本土

力量和保守本土力量有質的不同。前者很多時是十分在地的抗爭（如保衛某一地方的村莊、地標）；但後者卻很多時是針對的對象是十分抽象的想像群體（如自由行、外傭、中共政權等等，有時還往往是以抽象而驚嚇的數字示人，如十多年前的「167萬」和外傭的「12.5萬」）。

同樣地，不能否認的是，「左翼關係論者」所針對資本，很多時也是十分抽象的，而這些要打的資本敵人也很多時只是以數字示人（例如金融資本），很難捉得住，也很難定位他們的所在地；亦故「左翼關係論者」也很多時進入「不能只談資本在港內的胡作非為，但又不能不談港外資本壓迫行為」，在階級立場上難以處理因港內外不同受壓群體之間的矛盾，因而被指責為主張「世界大同」。

二、「資本是手段，蠶食本土文化是目的」：一個進步本土左翼的分析

由於不能明確定義「進步本土力量」的敵人，我們便只能假設有一個不知名的「敵人」，想磨蝕香港的本土文化、消除集體回憶和經驗、阻礙以抗爭為主體的本土身份的出現，令香港被中國化、被新自由主義化、被再殖民。但假若我們把「左翼關係論者」的敵人——資本——看成是這個不知名的敵人所用的手段。出奇地，我們又會發現這個敵人竟然是不斷利用資本流動和資本集中在香港不同層面運作，來達到這些令香港被中國化、被新自由主義化、被再殖民的詭計。且讓我們逐個層面作出探討：

（一）經濟層面：資本的流動（尤其是來自中國的資本）和資本的高度集中，在過去幾年都令香港的經濟問題加劇，這無論是從普羅市民的社會流動經驗、買樓置業困難、貧富懸殊加劇等都是明顯的。面對來自中國的資金，香港人存在主觀和客觀的矛盾。客觀上不能不認同「食大陸水」來開飯的事實，主觀上又不想與內地融合（詳看拙文，〈從民間角度看中港融合：主觀意願和客觀現實下的矛盾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543>）。但過去幾年，不同的內地資金影響普羅市民的生計（如炒貴樓，加劇住屋困難）的力度有增無減。而且，這種食大陸水的無奈事實又不斷打擊香港人過去一直以來的優越感，使一直存在的矛盾心理更加深刻。

（二）文化層面：過去幾年的香港，資本流動摧毀本土文化也不是鮮見的。天星、皇后、高鐵、菜園村，以及不同地方的重建都是十分明顯的例子。這些資本對本土文化的高度蠶食，既把香港變成一個越形不是為香港人服務的城市（從自由行常去的商場中可見一斑），又把香港越形變成一個缺乏個性和集體回憶的「資本城市」。

（三）社會層面：資本最明顯的影響是，藉越來越厲害的貧富不均，來激化低下階層之間不同社會群體的矛盾，從而撕裂社會關係，製造不同情程度的排外政治。在這方面，我們也不難找到例子，好比本地工人說黑工、內地人和外傭搶飯碗。此外，內地貧富問題亦為香港的公民權利帶來問題，一方面具有資本的內地人被政府以不同渠道認可地得到公民資格；但另一方面沒有資本或逃避超生懲罰的內地人又循不同途徑到港得到公民身份和享用社會福利（如雙非兒童、醫療服務、幼兒教育服務）。這正正都挑戰香港人對內地人士容忍度的底線，又在港人心中埋下排拒內地人士的種子。

（四）政治層面：資本家在香港政治體制中長時間享有高度政策和政治影響力，以致無論是民主和民生議題上都令香港裹足不前。他們更透過在議會內外的影響力，不斷以發展主義為核心的政策，方便內地資本抵港，和在港進行資本累積。另外，這些不民主的政治架構，再加上越形威權的統治政府，又令自由空間不斷收窄。

故此，經上述的分析，假若我們要反抗的是一個令香港被中國化、被新自由主義化、被再殖民的敵人，並認為這個敵人是以資本作為手段來進行這些詭計的話。「進步本土力量」和「左翼關係論者」二者也不是沒有共同的溝通點和議題。他們大可以共同合力一方面抗行這個假想敵的資本手段，也可以防止本土價值和身份得以蠶食。

三、民間社會契約及公民身份

接著，我們對香港故有社會契約作歷史考察。我們會看到，前文的假想敵和其運用資本的手段都在過去不斷瓦解香港故有的社會契約。只有把近來的社會狀況放置更原始的狀態去了解「政府與人民」及「人民之間」的關係，而非只是針對「身份」和「排外」的問題，才能理解為何新的民粹勢力抬頭的社會基礎，及提出進步的新社會契約藍圖。

在香港，一路以來，政府和人民間存在的社會契約是建基於一個以經濟機會平等的論述（注意，不是現實）而存在的。故此，要這社會契約得以運行，需要至少三個前題：

- （一）經濟上大家都有向上流的實際經驗和主觀期望；
- （二）政府在財富以至資源再分配上的角色要達到所謂的機會平等；
- （三）人民將自己某些錢、資源、權力和權利自願地交予出來組織一個政府，其中不單是維持政府的日常運作，更重要是希望政府能利用這些資源來保障自己其他的權利和自由，免受其他人的傷害。

但經中港各方面融合和政權轉移後，現實情況卻是：經濟向上流的經驗和期望已經消失（第一個前題沒有了）；政府在不同的再分配機制上（如醫療和六千蚊）都不能再發揮作用，更令人覺得政府本身的存在已成了導致不公的主因（第二個前題都沒有了）。在所謂的「蝗蟲論」下，令香港人漸漸覺得自己的權利及（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優越感都受到侵蝕，故在不同階層中產生不同情度的恐懼和不安（在這情況下，連第三個前題都差不多沒有了）。

在政府功能、角色和合法性瓦解的情況下，以及慣常政治渠道無法補充政府合法性（如民主選舉）下，即社會契約瓦解之時，社會會趨於原始的蠻荒狀態，人類會只為私利而互相仇殺（現在情況不是很似嗎？），但有些人卻想再次脫離這蠻荒狀態而另組新的社會契約；而每一個新社會契約的訂立，又總要重新界定新社會的成員（所謂的公民），以及成為公民的原則，亦故為何近來這麼多的「我們／你們」和排外的論述吧。

那麼新社會契約需要有什麼內容？假若要結合進步本土力量及左翼關係論者的目標，我們便需要一個有不同層次的社會願景及新社會契約。而且，這個新社會契約是不能再以往日的神話作為元素：例如要捨棄所謂的香港作為奇蹟之地神話（什麼獅子山故事云云），要知道過往的成功相當大程度上建基於因緣際會的地緣政治（中港分離和冷戰格局，而這種格局已不復出現）、剝削（對本土庶民生活／文化資源以至國內血汗工廠工人）和特區特權（中央派糖），從而斬斷民粹的自我優越感的根源。

新社會願景能包含的元素可以是：在經濟層面，適度地容許和約束資本在本港的流動和集中的程度和提倡經濟上的生產和分配公義；在文化層面，保護和提倡本土文化，建構以本土文化和在地經驗為主軸的本土身份；在社會層面，提倡具約束力的

公民權利身份（以針對雙非嬰的問題），多元、社會融合、尊重不同族群；在政治層面，抗拒威權統治，推進民主及自由空間。而人民與政府的新社會契約亦應是回歸到落實公民權利的在不同層面上。

那麼誰能成為新社會契約的締結者？新社會契約又應是如何達成呢？

除政府（在於暫不論是香港政府還是北京的中央政府）作為新社會契約的當然成員外，誰能成為公民呢？這裡的問題核心在於：如何定義公民？誰有資格成為公民？及成為公民需有什麼權利和義務（亦即上述所提出的「具約束力的公民權利身份」）？在現代社會契約的理論中，一個人要成為社會契約的成員便必須接受一系列由政府經立法來制定的行動束縛（比如交稅）。這是一個共識過程。十分可惜的是，在香港，這個共識過程在過去三十年都是從政府（不論是中國政府還是英國政府）單方面制定，而港人參與的份量又十分少（一眾政商財閥除外）。而這裡我們亦可以看到為何基本法本身便是多年來問題的來源——在缺乏民間社會討論和參與下的基本法，其作為社會契約的合法性便已大打節扣，更何況是在問題爆發後而港人又無力修改其內容，便使其合法性更加降低。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公民社會」如何才是真正社會契約共識產生的場所。

提出新社會契約的重點在於：要處理如日益嚴峻的新移民的問題，首先無論是政府和民間社會都需要認識到「社會契約是一個不斷演變的共識過程」的事實。而在這過程中，民間理性地討論公民身份是十分重要的。這亦為何滲雜歧視、對罵、嘲笑、扣帽子等的討論如何無助解決當前的新移民問題。而且，這亦為何要結合一種能抗拒保守和排外的進步本土左翼力量在民間社會的鬥爭場域中把公民身分的討論重新導向至以理性為基礎的人口政策及港人身份的法律討論。排外，並不是真正解決日益嚴峻的新移民問題；要如何令新移民在獲得港人身份和權利的同時，又要令他們接受和遵守一系列法律的約束和義務才是重點。這些都是可以實在地通過政策和法律的討論來達成的。

看來，一個從民間社會出發，真正透過理性辯論和立法來產生的新民間社會契約，才是解決新移民問題的根本方法。假若只是抱著能由政府單方面制定社會契約的方法（如行政手段和釋法）來解決新移民問題，這只是掩耳盜鈴。

* 本文較早版本見於獨立媒體中：蕭裕均，〈「進步本土左翼」，可能嗎？〉，《每月評論》，2012年1月27日。

註：

1：「Relational」是借用歷史人類學家Eric Wolf 在其《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的用法。Eric Wolf 認為理解社會現象和變遷的正確途徑是要考量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和地緣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缺一不可，也不能把任何箇中因素看成是有決定性凌駕其他因素的條件。其實，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機器和大工業〉的註4中，亦提出相似的關係論的論點。馬克思認為要考察社會變遷，要以人類和科技、生產關係、再生產關係和思想框架的互動作為基礎。我認為有必要把這冗長的注在此引出，因為這才是真正馬克思分析社會的唯一科學方法：

「達爾文注意到自然工藝史，即注意到在動植物的生活中作為生產工具的動植物器官是怎樣形成的。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個特殊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的形成史，難道不值得同樣注意嗎？而且，這樣一部歷史不是更容易寫出來嗎？因為，如維科所說的那樣，人類史同自然史的區別在於，人類史是我們自己創造的，

而自然史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工藝學會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係，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以及人的社會生活條件和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甚至所有抽掉這個物質基礎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實上，通過分析來尋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過來從當時的現實生活關係中引出它的天國形式要容易得多。後面這種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學的方法。那種排除歷史過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的缺點，每當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專業範圍時，就在他們的抽象的和唯心主義的觀念中立刻顯露出來。」

此外，本人定位自己為後者，並樂意應用這關係論的科學方法。假若有人因此而把我歸類為修正主義者，我也是十分欣然接受這指控的，因為這樣的話，馬克思也應該是修正主義者。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界定本土與左翼的問題》

評論人：蘇耀昌（標題為編輯所加）

蕭裕均寫了一篇視野很大的文章，有關本土及左翼運動結合，正是之前大家講的東西。當然蕭裕均寫的時候不知道剛才大家所說的，現在卻巧合地在他的文章手上進行了一個結合。

首先，蕭裕均提出過去十年，就是零三七一至今，香港有兩種趨勢正在發生，一是「中國化」，一是「新自由主義化」。這兩種變化引致公民社會的反彈。蕭裕均列舉了兩對，四種力量。以他的說法，第一種是左翼，分為「左翼關係論」，及「左翼經濟論」。第二種是本土力量，分為「進步的本土力量」，及「保守的本土力量」。蕭裕均十分直接將自己界定為「左翼關係論」。

他提出，究竟進步的本土力量能否與進步的左翼力量結合呢？結合後就叫做「進步的左翼本土力量」。為何要結合呢？他提出的理由是，本土力量與左翼力量自己都搞不好，各有自己盲點。先說進步的左翼力量，其最大問題是分析的敵人是資本，但資本是流轉的，游走不同國界的，所以進步的左翼在分析資本時，往往處理不了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當兩個族群衝突時怎辦呢？可能大家也是窮人，譬如香港的基層工人面對新移民，可以怎樣處理？剛好進步的本土力量，它的鬥爭是在地的。蕭裕均心中想著的可在天星、皇后、菜園村、重建抗爭等。他認為這些具體的鬥爭場域正好提供了一個，我稱之為落腳點，給予進步的左翼力量令其龐大的分析可以落到一個具體的鬥爭點上。而香港的進步本土力量，雖然在地，但大多都是防衛，分散的，因此需要左翼提供一個能連合諸種社會關係的分析，統合成一個分析框架。所以這兩種力量結合起來，便會開出香港社會運動發展的方向。這是他所期望的。

我感興趣的是，在蕭裕均的分析中，他想連繫「左翼關係論」及「進步本土力量」，而不處理「保守本土力量」及「左翼經濟論」。那他如何界定「保守本土力量」？他說前者是以排外姿態來設定主題，他用葉蔭聰頭的講法，就是承繼了大香港主義，對香港有一種文化想像。

「左翼經濟論」又如何呢？蕭裕均說是一種階級戀物拜物主義，以及單純以經濟角度作考量點的主張。大概從蕭裕均的角度，這兩種力量不夠進步，參加不到進步聯盟，所以就不太處理了。這種界定是否有效？由於蕭裕均以「左翼關係論者」的姿態出現，我們就從這個定位開論。

對「關係論」，他引用Eric Wolf在*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裡所講的，就是：理解社會現象和變遷的正確途徑，一定要考量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及地緣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不能把箇中因素看成有決定性凌駕其它因素的條件。

就是說，你不能以一個因素凌駕另一種因素來進行分析。蕭裕均就是用這個講法界定「關係論」。文中他引用《資本論》的一個注釋，引了好大段，證明馬克思的分析方法是與Wolf上述說法是脛合的。但我覺得馬克思不似這樣說。以我理解，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左翼，都努力追求歷史過程裡，有什麼關鍵的因素會影響其他因素，或尋找當中比較重要或結構性的因素，而不會說排除某個因素對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果蕭裕均將他理解馬克思所說的那段話表述為「馬克思排除了預先、非歷史

蘇耀昌：加入過基層權益互助社、基層大學、街工等團體；出版過民間抗爭、基進論壇、街角等刊物。三十年屢敗屢戰，現職街工。

地假設某一種因素無論任何情況下凌駕另一種因素的話」，那我是收貨的。但明顯蕭裕均不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有需要看看馬克思的原文，我唸一唸，馬克思說：任何不理會這種物質基礎的歷史論，是非批判的；若能從這些真實生活關係中，得出相關的塵世形式，會較輕鬆容易。自然科學的抽象唯物論，是一種排除了歷史和歷史過程的唯物主義，它的缺點是顯而易見。

可見，馬克思並沒有說歷史分析應像自然科學一樣，像有些人批評說馬克思所說的；不是，馬克思正正說不是。那麼，蕭裕均以上述偏頗的定義及以其「左翼關係論者」姿態排除「左翼經濟論」進入進步同盟時，他的問題在那裡？究竟在香港的脈絡裡，蕭裕均所指的「左翼經濟論」是甚麼人？我想，他是否說我這類人呢？

於是我有一個合理的懷疑，其實蕭裕均並不是那些贊同以一個因素絕對凌駕另一個因素的那些馬克思主義者(因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很少)，我擔心他是否指那些仍用階級分析的人？蕭裕均的文章並未提到或使用階級分析這詞。這裡便呼應到我們剛才的討論，我說早上沒有太多階級分析。這裏，我想到列寧，因為列寧在《怎麼辦》大幅批判了「經濟主義」。我不知可否與蕭裕均對的批判「左翼經濟論」作一比較。

列寧是怎樣說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經濟主義」呢？他說「經濟主義」這個名並沒有深切表達它的實質。他說「經濟主義」並不否認政治鬥爭，與其說他們否認政治鬥爭，不如說他們崇拜鬥爭的自發性。列寧將經濟鬥爭及恐怖主義相提並論，說「經濟主義者」崇拜自發的，純粹的工人運動，「恐怖主義」崇拜那些不善於或者不能夠把革命工作同工人運動結合成一起的知識份子的自發的激憤。讀到這裡，我會想，如果你講香港的「左翼經濟論者」，是否指「進步的本土運動」？他們崇尚自發與激進啊！是否指周思中呢？

我開始懷疑，蕭裕均所說的「左翼經濟論」，是指像我一樣沿用階級分析及在社會運動上專注於勞工運動的人。其實，對自我局限於狹義工人運動也是列寧批判「經濟主義」的主要內容。不過，列寧不是抽象地否定。他說在俄國工人運動早期，當工人還未組織起來時，俄國社會民主黨曾要求工作人員嚴厲執行工人階級工作，不要搞其他東西。這是形勢的需要。所以，如果蕭裕均說的「左翼經濟論者」是指那些不參與身份政治、文化政治、或是只喜愛介入工人階級做事，用階級分析的話，那麼要評價「左翼經濟論者」，就首要看今日香港的政治環境、文化環境、工人階級的環境是怎樣？究竟我們應否在建立進步同盟時應把它排除在外？還是更應該恢復對經濟的分析，對階級的分析，對工人的工作？

最後想講蕭裕均也沒有處理的「保守本土主義」。我覺得，不妨引用葛蘭西分析「南方問題」的方法，「南方問題」不是指意大利的南方，葛蘭西說它是個全國的問題。以香港來說，用「南方問題」角度分析，香港內部既有南方和北方，我們有中產階級，有資產階級，有窮人；在中國與香港的關係中，我們也有南方和北方，我們看不起國內同胞，如同意大利北方看不起意大利南方一樣。

如果我們忽略階級問題，我們將看不見香港中產階級及香港人身份是如何形成；也看不見壓在這身份下的基層狀況是如何。最後結果是，「保守的本土主義」會把我們的基層民眾捲到他們那邊。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主體性中的階級成份》

評論人：蕭裕均（標題為編輯所加）

我先講一講我寫這篇文章時的狀況。這篇文章是我上一年年頭寫的，當時剛剛出了D&G事件，雙非問題。當時出現了兩個不同群體，一個是所謂進步的本土，另一個是保守的本土，但我比較認同陳允中的說法：開放本土派和土著本土派。我當時就想，因為我自己的研究是中國香港的勞工階級，所以我不能不處理中國問題，也不能不處理階級問題，也就是為什麼我寫這篇文時，有一個好明確的運動的指向。而我所做的，就是希望提出一個可行的框架，可行的社會圖像。我最主要想講的是不同的群體。我定義群體其實希望能引伸出兩種比較進步的力量，他們有共同的agenda。而在文章的第二部份，我提出了資本是一種手段，蠶食本土文化，再以這個框架我提出一個agenda，給兩種不同的進步力量一個運動上的扣連。

究竟哪一個是左翼經濟論？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在香港，當時很多人說左派，但其實是否真的存在如此獨斷、只用經濟去分析階級的角度呢？我覺得不是。我只是分析、定立了一個群體，我未必想像某一些人一定是這樣想的。

關於文章的第三部份。有一次我跟羅永生講，他提到跟populism有些關係，但是我並不想講這些抽象的東西，比如民間社會契約那些。我跟大家問同一個問題就是，究竟誰能夠成為新的社會契約者？誰能夠定義為公民，他們有什麼義務？我覺得這種講法是比較具體操作的。因為我們一定要問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真的要從民間社會出發，那我們應該如何定義哪些人有權在過程當中建構一個我們未來想像的社會？我們在想像一個怎樣的社會？另外，張少強也講了中產階級的問題，其實這是香港的階級分析。一直以來，比如八十年代，也很注重中產階級，講階級時就講中產階級是一股進步力量。我曾在另一篇文寫過，其實這只是catalyst，一個necessary condition，但不是一個sufficient condition。

我在想，如果以一個階級來算的話，我們一定要找些什麼人，但那個階級又好像沒有傳統，這樣又回到主體性的問題。究竟香港，一直講主體性，階級的成份在哪？我覺得好似缺席。我剛才聽到一個好有趣的情況，就是我們要等到一個負責的意識出來，條件才能成熟。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線性意識的發展過程，如果容許我講，之前階級意識的說法也差不多是這樣，這與列寧開頭講spontaneous consciousness，然後去到一個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之後才去到class consciousness，是十分相似的。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梳理本土力量的「內外」關係》

回應人：張少強（標題為編輯所加）

我留意到這幾篇論文都明顯存在共同旨趣，就是處理今日香港「本土力量」的內部光譜及方向。按蕭裕均在《本土與左翼：運動連結與民間社會契約》的觀察，本土力量可以分為：「保守本土力量」及「進步本土力量」，而左翼則可分為「左翼經濟論」及「左翼關係論」。我並不打算深究以這樣的用語來作區分是否妥貼，正如蕭裕均自己都強調，他的用語是臨時亦都是粗略的。他最終的關注也不在此，而是怎樣可以找出共同的立場及方向。就此，蕭裕均認為可行的方法就是找出各方共同面對的「敵人」。這一點確實令我讀其論文之時聯想到毛澤東主義的革命策略，以「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來打造革命戰線上的「我們」。雖然蕭裕均強調「敵人」是「不能明確定義」而又「不知名的」，但他還是提出這個共同「敵人」就是「資本」，特別是由中國來的跨境資本，促使香港本土失去本土。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他認為可以做「朋友」的是「進步本土力量」和「左翼關係論」。

我特別想多聽蕭裕均對所謂「本土力量」內部倫理是怎樣理解的。我用「內部倫理」這個講法，既是要處理內部差異，亦是要處理當中所存在的實然及應然關係。例如：當中的實然關係是否確是好像蕭裕均所講的兩極對立？本土力量內部的應然關係是否只是「進步本土力量」和「左翼關係論」的連結？那麼「保守本土力量」和「左翼經濟論」應是怎樣處理？要把他們當「敵人」來壓倒，還是可以當「朋友」來結盟？

另外，我想借題發揮的一點就是：既然「本土力量」不是鐵板一塊而是有其複雜光譜及倫理，今日威脅本土的主要力量又「中國化」，我就覺得有必要同時搞清楚「中國化」有什麼複雜光譜及倫理？

我想做的並不是要找個就手的共同「敵人」出來(亦即稻草人)，藉此暫且延擱內部矛盾來達成各為「共同」實為「權宜」的目標。我的目的是希望可以正視香港本土的現實細則，並按這些細則在本土之內可以就地進行的培力運動，而不是擲出愈來愈大的框架或綱領來統整本土力量的方向。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只能粗略指出幾點：

首先，我們所講的「中國」已是「中共」，「中國化」就是要跟大陸一樣在「中共」的支配之下。但所謂「中共」的支配，其治國之術，已不再只是冷戰時期那樣一種左的權力，而是同時具有右的力量，保留了意識型態之爭，第三世界意識，亦在擁抱資本主義及全球化。在華人之內，它的影響力訴諸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且包含「一國兩制」對殖民主義的循環再用，以及高舉發展主義進行大中華帝國追求。因此，我總覺得要去問「中共力量」或所謂的「敵人」在哪裡。若然將「中共力量」有意無意地視為外來，或者講到好似全是外來的，都是忽視了香港本土的真實構成。

仔細來說，香港本土往往內藏跟「中共力量」一致的構成元素：比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殖民主義、資本力量、發展主義、帝國追求。換句話說，這些所謂「外來」威脅都可以是「內在」自身想像的部分。這亦只有如此，香港與大陸才會那麼難分難捨，外來的干預可以成為內在的實況而不是跟香港本土無關，本土力量才會

張少強：香港樹仁大學質性社會研究中心總監，社會學系副教授，長期從事本土社會及文化研究，並主編《香港社會及文化研究系列》。

覺得受衝擊，要行動。內外對立的想法令人看不見香港本土一直都是同時包含「內外」，由「內」和「外」辯證地構成。

舉一個例，「維多利亞港」既已在本土出現，就不可能不視之為本土部分，它甚至已經屬於本土身份認同的一大自我參照。但維多利亞港明顯包含殖民色彩和跨國資本主義，並在1997年後出現愈來愈跨境的中資機構，令其景觀夾雜愈來愈多宣示中國在場的偌大中資招牌。故此，梳理本土力量必須同時處理各式各樣的「內外」關係，或更為準確來講，是難分「內外」的糾結。

是故，我也覺得要將「中共力量」分為「北共」和「港共」，前者是指北京中央的統治力量，後者是指本土內部的建制力量。我的基本看法是：「港共」比「北共」更「中共」，更以多重的混雜歷史及權力叢軸（nexus）強行亂來，達成任務。當然「港共」內部亦都可以再分，不過我暫且只以「港共」對「北共」來講。

最值得關注的地方就是：香港的「中國化」往往是由「港共」按照自己估計的「中共」是什麼，「中共」要什麼而搞出來的，其程度甚至可到「北共」都沒有這樣的打算。縱使真是由「北共」提出，往往都是上面講一句，下面加三段，上面出一拳，下面加三腳。香港的「中國化」是由「港共」決定及帶領，多於「北共」，其所採用的立場、手段及取向可以比「北共」更差。就連「北共」都可以是受到「港共」的「中國化」所累。我這樣說並不是要幫「北共」御責，「北共」是自己把權力分給「港共」的，用「港共」來治港的。我倒是想指出香港的「中國化」是內在多於外來，就算是由「北共」直接而來也必有「港共」的中途加工。

所以，若然要講「敵人」的話，那麼「內鬼」更要急需處理。本土力量所要的培力行動，就是要讓多角多方的抗爭主體在不同地方捉不同的「內鬼」，促使那些令得本土沒有自決能力的「中國化」無法著陸，自身所要追求的「內外」關係能夠在可及的、近距離的本土內部就地開展，不是把所有矛盾揉成一團，減約到單一的（外來）「敵人」或同一的（遠方）「綱領」，無視「敵人」的動態生成過程跟自我構成的複雜連系，甚至自我奴化的主動合謀，並把所有內部爭議視為不應出現的「內耗」而忽略這些內部爭議實有連結本土及重議內外關係的重大作用。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